

行业特色大学建设应有中国特色

■王顺洪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除综合性大学之外,还有行业特色型大学。这批大学是指由原来中央业务主管部门调整建制划转至中央教育主管部门的一类重点大学,学校学科相近且集中,与行业紧密联系,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具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实力。行业特色型大学要创建“双一流”,应在“行业”“特色”上下功夫,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立足行业、推动制度创新、志存高远面向世界。

作为我国第一所工程高等学府,创建于1896年的西南交通大学因路而生、因路而兴、因路而强,被誉为“铁路工程师的摇篮”。作为行业特色型高校的一个典型代表,西南交大在建设“双一流”的进程中,总结了一些自己的经验和做法,希望这些做法能给国内行业特色型高校的建设带来一些启示。

首先,行业特色型大学要办出中国特色,就要主动对接并服务国家战略。在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已经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行业特色型大学只有服务好国家战略需求,才能在行业中具备发言权,才能在发展中拥有一席之地,才能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也才能在对接并服务国家战略中进一步凝练特色,凸显优势。

在这方面,西南交大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服务“一带一路”和高铁“走出去”,在科技支撑、人才支持,尤其是教育服务方面大胆作为。比如今年6月1日,中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蒙巴萨—内罗毕轻轨铁路首班列车发车,西南交大领衔的轨道交通职业教育联盟承接了该项目铁路教育服务,为肯尼亚培训各铁路专业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

其次,行业特色型大学要办出中国特色,就要立足行业、依托行业、支撑行业、引领行

业。行业特色型大学与行业、企业不仅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的价值共同体,共同肩负着科技创新与服务社会等使命。行业特色型大学要积极主动加强与后者的联系,以贡献求发展,以服务求支持,要将产学研合作作为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并以此推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质量。有才有位,高校真正为行业、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在行业中不断扩大影响力,才能实现学校改革发展目标。

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是对行业最核心的支撑。在这方面,协同创新是高校对行业最直接的支撑,西南交通大学在与轨道交通企业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基础上,积极探索新型战略合作关系。如学校已与中国铁建签署磁浮技术研发战略合作协议,就磁浮技术研发合作进行精准对接,助力磁浮交通技术与产业发展。

再次,行业特色型大学要办出中国特色,就要科技创新同时敢于推动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高校产出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行业特色型大学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需求,始终站在引领行业科技创新的前沿,具有科研针对性强、技术转化率高、成果可工程化程度高的特点。

依然以蓬勃发展的中国高铁为例。目前,中国高铁已经正式跨入“中国标准”时代,已经成功拥有世界先进的高铁集成技术、施工技术、装备制造技术和运营管理技术,“中国速度”的诞生离不开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成果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

在致力于科技创新的同时,西南交大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难的“老大难”问题,在政府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下,2010年开始小规模试点,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极大地释放了科研活力。这一改革之路,被媒体称为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问题的“小岗村试验”。2016年全校



推广改革措施以来,已有超过120项职务发明专利分割确权,7家高科技创业公司成立。

最后,行业特色型大学要办出中国特色,还要植根中国、面向世界,敢为人先、勇立潮头。定位决定了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大学定位是关系到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动态性发展问题。就行业特色型大学而言,“依托行业而产生、服务行业而发展”的既有格局面临着新的挑战,大学自身的发展以及对行业的支撑与服务都需要重新思考定位。行业特色型大学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从对行业的依托服务转向走出行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而实现对行业的引领与超越。

从轨道交通行业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无论

“就行业特色型大学而言,“依托行业而产生、服务行业而发展”的既有格局面临着新的挑战,大学自身的发展以及对行业的支撑与服务都需要重新思考定位。

是高铁的技术标准还是高铁的营运里程,中国都已经名列前茅,开始引领世界高速铁路发展进程。然而,从现实责任来看,面对欧、美、日等国更高速轨道交通技术的挑战,我国亟待开展以速度、能力为目标的变革性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以持续保持在轨道交通领域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对于国内相关领域的行业特色型高校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因此,我们应该正视高校本身的优势与缺陷,在现有基础上,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力度,力争通过更好的技术开发,继续保持和巩固中国高铁在世界相关领域的领先地位,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持续稳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记者快评

大学生实习『不差钱』?

■陈彬

每年暑假,总有大批的高校学生怀着各种期许,走进企业和其他机构,开始一段对自己而言,或熟悉或陌生的实习生活。大学实习生早已成为了人们眼中司空见惯的一类人群。但是,当一个普通员工每月领取属于自己的那份劳动所得的时候,这群实习生是否也能拿到一份自己应得的“薪水”呢?

不久前,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全国各高校697名大学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4.96%的受访者利用假期参加过或正在参加实习,其中有40.11%的被访者在实习期间没有收入。

接近一半的大学生实习生活处于一种“不差钱”的状态。当然,这不是他们真的不缺钱,而是他们拿不到本属于他们的劳动所得。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公众长期以来对“实习”的理解有偏颇。事实上,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实习”一词拆分为“实践”和“学习”两部分,即学生通过在用人单位的实践而学习知识。

但人们通常会将重点放在实习的“学习”作用上,也就是强调实习行为对学生的帮助,而忽略了学生的实践付出以及对用人单位所带来的帮助。

既然实习是在“帮助”学生,学生当然没有权利要求报酬了。

其次,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带来一个并不正面的影响,那就是似乎“读书人”是不应该谈钱的,否则便有了“铜臭味”,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依然有一定的市场。于是,高考状元报考经济类专业被视为风气不正,毕业生选择高薪职业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虽然这或许并不是普遍现象,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在这种观念下,实习生谈钱也就成为了难以启齿的事情:“你是来这里学习的,实践知识难道不比金钱重要吗?”

在此,我们否认实习对学生自身成长的重要性,甚至实践知识的确要比金钱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拿工资的实习生便是“可耻”的。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作为劳动者的实习生既然付出了劳动,根据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准则,就不应该得到回报,这与获取知识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矛盾。

尽管道理如此,对于企业而言,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生存之道。因此指望企业自觉地兑现对实习生的薪资待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实习生在企业面前也基本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要确保实习生获得合理的劳动所得,最根本的做法依然是通过法律和制度约束企业的行为,或者直接将实习生的权益保护纳入《劳动法》中。在这方面,相关立法机构应该采取一定措施。

域外传真

英国毕业生被迫超额还款

■迈克尔·巴格诺尔

英国一些毕业生们反映,他们在毕业后,学生贷款公司依然会从他们的工资中每月扣取300英镑,尽管他们已经付清贷款。有些学生谈及他们经过两年的争取才得到资金偿还。以上反馈均来自一些毕业生,他们断言这令人震惊的待遇是出自政府支持下的学生贷款公司。他们指出,不应该有任何一家英国的金融机构可以逃脱处罚。

来自埃塞克斯的泰吉·海厄特花费三个月的时间,尝试阻止学生贷款公司每月从其工资中扣取300英镑。在拨打过5次电话后,他已经走投无路,只能等待着下个月再被扣除300英镑。一名IT行业工作者于2005年在威斯敏斯



图片来源:卫报网

特大学获得了商学位以及计算机科学学位。他现在已经额外付了300英镑。“每次我打电话到相关部门,他们总说会给我公司的薪资管理部门发布停止扣费的通知,但是当我问及薪资部门的人员时,他们说并未收到这样的通知。”

“我还尝试过通过信息要求资金偿还,但是似乎这项要求也不存在于系统之中了。现在虽然我发出了正式的抗议,但是似乎毫无意义。所有的一切都令人灰心丧气,我甚至在几个星期后才能得到回复,而那时,他们已经从我的工资中拿走了300英镑。”海厄特只是众多面临相同问题的毕业生中的一个。而他们灰心丧气的父母只能诉诸报纸的金融专栏。

在收到的所有抗议中,最多的一条就是没有一条明确的声明指出在他们到底还欠着多少款项。数值还停留在上个税收年度,距今已有一月之久,而且英国税务与海关总署每年度才会直接将金额数值发至学生贷款公司,再被分配到每个账户。

还有人指出来自非营利组织的员工经常遗失文书资料,但是却会对那些移居国外并未在文件中完善他们收入相关信息的毕业生予以更严重的处罚。如此混乱的贷款体系,除非整个系统进行革新,否则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尽管银行受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管辖,

但是学生贷款公司直接对接英国议会。因此,当毕业生遇到问题时不能直接诉诸于金融督查服务机构。他们需要向问题呈报给由教育部指定的独立顾问。

如果这一步成功了,议会监察使将会接受这个案子,除非毕业生能够赢得议员们的支持,如果议员住院了或者单纯对你的事情不感兴趣,那么毕业生将无处可以倾诉。事实上,去年议会监察使只调查了30件学生贷款纠纷,而他们接收到的案件总量达329件。

在一则声明中,学生贷款公司表示:“我们有470万顾客还款,在上一个财政年度,我们只收到了少于1%的来自这个群体的抗议。我们承认错误时有发生,也会有我们的服务未能满足顾客需求的时候。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时,我们会从这些抗议和抱怨中吸取教训,来推动我们服务的发展与完善。”学生贷款公司还表示,他们将会通知那些能够在23个月内偿还余额的顾客,邀请他们加入防止超过还款方案,这样能够保证贷款方在还清贷款后不再继续被扣除还款。

对于海厄特的事件,学生贷款公司表示他们已经发出了一系列的停止信息给英国税务与海关总署,如今已经将3544.82英镑全额退还给海厄特。

(作者系《卫报》金融专栏记者,许悦编译)

失败不过是成功之母

■钱革

次失败。或者说,创新失败者未必最后能成功,但创新成功者一定经历过多次失败。当然,众所周知,在事前选拔出真正的创新性人才十分困难,但无论如何,给失败者以更多机会,这应该是推进创新的重要方式甚至是“不二法门”。

我们可以将科研成果未能通过职称评审中的科研评价环节作为一次失败的科研创新,但对其原因却需要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研评价中同行评议的权力主要掌握在一些著名学者的手里,而著名学者的学术水平固然毋庸置疑,但道德上我们只能假定其为普通人。因此少数著名学者所作的少数几次科研评价完全有可能因为各种学术或非学术因素而出现重大偏差,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就将某些教师“一棍子打死”确为不妥。

如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没有人能否定牛顿或爱因斯坦的地位。但据记载,可能是因为“文人相轻”的心理作祟,当年英国皇家学会仅有的两位顶级科学家牛顿和胡克在给对方的学术评议意见中都出现了多处明显的刻意贬低对方之处(至少牛顿对胡克做过这样甚至更加恶劣的事);而爱因斯坦奠定了相对论基础的几篇现在看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当年全部发表在拒稿率只有百分之几的“普通刊物”——《物理年鉴》上。爱因斯坦第一次申请博士学位则似乎因为批评了在他之前的著名学者德鲁德和玻尔兹曼而失败,第二次他采取了比较模糊和世故的策略才获成功。而爱因斯坦申请副教授职位时,虽有一位同时申报者礼让,却因为科研之外的如演说能力等原因也曾碰壁。

再举一例,目前学界热议的中国当代研究型知识分子典范,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刻苦精神立志于冷门绝学研究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黄天华,他用31年兑现诺言诠释信仰:“中国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黄天华的副高级职称,因他主要从事跨学科的冷门领域研究,评了8次才通过(当然,还是让评的,而且评上了)。论者多以此为例盛赞黄天华“百折不挠”和“玉汝于成”,以教育为后盾。但笔者以为,在这里,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及期所在学院领导的鼓励和宽容也对黄天华的成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真正的学术研究也许注定艰难坎坷,但“对于一辈子献身学术的人,若未被学术界所承认,这是知识分子最难承受的打击”。

在笔者的知识范围内,实在想不出科研创新只有三次机会,不然就“不成功,便成仁”这一做法究竟有何学理依据,或勉强想出唯一的依据可能是中华传统智慧中“事不过三”这种说法。但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因此而忽视创新具体到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如一般而言,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创新之路更加艰难,这个可以从许多自然科学家三十几岁已功成名就,而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家都已白发苍苍得到直观的展现。

再如,跨学科研究在同行评议和科研评价中往往处于不利位置,但如果说应用型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可以用市场经济效益作为主要衡量指标,那么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如何体现和衡量?笔者以为,仅靠同行评议来评价其创新性是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而贯通各门学科和各个研究领域的跨学科

高教视点

据媒体报道,为了给自己挣大学费用,19岁的女孩赖承露在高达40℃的烈日下铲泥土,每天干活8个小时,长时间的重复工作,使得她原本娇嫩的双手一次次地起水泡。对于这位女孩,有人赞她懂事,主动帮父亲减轻负担,也有人说她家庭环境差,才会在这么热的天气干这么苦活。

感慨女孩要自己挣学费,表面上看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却可也折射出我国社会存在的已经扭曲的对待勤工助学的看法,即“又苦又累的活”是不适合孩子们做的。其实,不要说家庭贫困的学生应该利用假期勤工助学挣学费,就是家庭富裕的学生也应该懂得自食其力,利用假期时间打工,而不是完全依靠父母,养尊处优。

有些网友觉得假期打工挣学费的孩子挺“可怜”的,媒体在报道时也突出打工的大学生家境如何贫寒。这两方面问题,其一,把所有学生都应该进行的勤工助学变为贫困学生才做的事,并认为勤工助学“可怜”。在国外,很多富裕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后,就不再使用父母的钱,而是自己挣钱付学费。而为鼓励大学生自食其力,独立自主,美国的国家助学贷款面向所有大学生,而非只针对贫困大学生,即任何学生可通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工作后再靠自己归还。我国也一直鼓励大学生勤工助学,可是,有的家长却反对孩子勤工助学,认为“自己家里又不是出不起钱”“怎么去做下等人才做的事”诸如此类,在这种情况下,在考上大学后,有的学生利用假期勤工助学,也变成了“新闻”。

这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也一样。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的学生,一边打工干得精疲力竭,一边刻苦读书取得优异成绩,这是很普遍的事情。现在,如果有留学生说自己在国外端盘子洗碗打工挣钱,就会有人质疑:怎么去做这些事?何苦到国外去端盘子呢?

其二,在无意中,不是让学生觉得劳动光荣、学会自强自立,而是灌输“啃老”意识。不要说富裕家庭,现在就是农村家庭、贫困家庭,父母都想设法给孩子创造无忧无虑的环境,农村父母能不让干活的活就不让孩子干,孩子帮父母干一点苦活、累活,父母都觉得对不起孩子。像媒体报道的19岁女孩干活磨破皮,可是她父母的手早就磨出老茧了。试问,以前哪个在农村生活的学生不干活?如果学生只管读书,什么家庭责任都不承担,这些学生是很难对家庭有责任心、对父母有爱心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不仅教育孩子要珍惜粮食,更要知道劳动的艰辛,可今日有多少学生去体验过“锄禾日当午”呢?

不是说要家庭硬要给学生创造一个艰苦的环境才能培养孩子的艰苦奋斗意识,而是社会和每个家庭都应该明白,让学生养尊处优,该自己承担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都不承担,一旦干一点脏活、累活就“舍不得”,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对周围变得冷漠,而且也会怕吃苦,难以自立、自强。如此教育孩子,家庭和社会迟早会尝到“苦果”。

最近有媒体报道,有一所学校的大学新生在群里辱骂高年级的学长、学姐,原因是学长、学姐拒绝为他们搬行李。新生说,自己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这样对自己说话。如果真是这样,这是他的悲哀,也是他父母教育的失败,迟早他也会从社会中得到教训。近年来,每年新生入学报到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学新生手上什么都不拿,周围是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帮他搬行李,显得十分骄傲的样子,而那些独自报到一个人扛行李的学生,还会被认为“可怜”:“怎么就自己拿?这完全是颠倒、扭曲的观念。学校和社会应该鼓励的是,所有学生都自己独立报到,自己的行李自己拿。”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正是实现创新的一条重要路径。

又如,某高校在具体执行上述规定时,对副教授申报教授经常网开一面,而对讲师申报副教授则严格执行。这在笔者看来又与人才发展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因为副教授一般而言研究领域和方向都已基本确定,如果报了三次教授职称都没通过,笔者以为,这位副教授在这一研究领域可能确实已经“江郎才尽”,没有研究潜力可挖了。但作为一名讲师,尚处在研究生涯的起始和摸索阶段,虽然申报了三次副教授没通过,之后他却或者发表了新的重要科研成果,或者获得了高一级学位,或者转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们为什么不能本着“特别爱惜人才、特别鼓励创新、特别宽容失败”的精神再给他申报机会呢?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不久前发布的《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开展职称工作的四条指导原则:一是服务发展、激励创新;二是遵循规律、科学评价;三是问题导向、分类推进;四是以用为本、创新机制。而笔者以为,上述“累计申报同一级职务三次均未通过者不再具有申报该级或更高级职务资格”之类的规定正与上述四项指导原则南辕北辙,因为这样既不看研究领域也不分研究类型,“一刀切”地将一些在科研创新中遭遇三次失败的专业技术人员“一棍子打死”,这使得这些人无论作出多大贡献也很难再在本单位有成就感和获得感,如此这般的人才评价“指挥棒”又怎么能“用好活人才”并“最大限度释放和激发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呢?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师)

大学生打工挣学费『可怜』吗

■熊丙奇